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谈判的看法与主张

作者简介：邓红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探究和推进两国边界谈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边界谈判的进展及原因、当前的谈判难题和障碍以及未来出路方面，众多印度学者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存在许多偏见和欠缺。了解印度学界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研究现状，有利于探究印度精英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看法和主张，也有利于反思我国中印边界谈判研究及外交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关 键 词：印度#中印边界谈判#学界观点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对华政策”(项目批准号09CSS007)的研究成果。

　　1960年中印两国总理和官员即已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会谈，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未能阻止两国走向边界冲突。1981年，中印边界谈判在两国关系缓和后再度开启。三十多年来，两国谈判持续进行并取得了不少成就，对此国内外学界和媒体进行了不少报道和分析。本文将从边界谈判的进展、问题、可能方案以及路径等方面，介绍印度方面的看法和主张。

　　一、对于中印边界谈判进展的看法

　　自1981年以来，中印边界谈判持续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在维护实际控制线和平与安宁、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性原则和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建立了不同级别的中印边界谈判机制；两国边界贸易也在中断多年后再度开启，等等。然而，对于中印边界谈判的进展，印度官方和学界的看法差异很大。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谈判特别代表S.梅农高度评价两国边界谈判成效。梅农认为，“当我们观察我们的关系和边界，我们事实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们很好地处理了双边关系。边界保持了和平，我们在走向最后解决方面也取得了进展。”①印度学者也承认两国边界谈判取得了成就，但普遍对谈判进展不满。高塔姆·达斯抱怨：“关于争端的实质立场基本上与1959年到1960年一样，外交和军事优势仍在中方。”②还有学者甚至否认中印谈判来之不易的成果，如昌德拉·莱赫·乌帕德亚雅认为，保持实控线和平与安宁的1993年协议没有意义。③

　　至于边界谈判进展缓慢的责任，印度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中国没有谈判诚意和积极性；二是印度的谈判态度不积极；三是中印双方都有责任。

　　印度学者主要是指责中国没有谈判诚意和积极性，如潘纳拉尔·达尔认为，中国对讨论边界问题没有兴趣，因为这必然涉及中国不能接受的意味着承认西藏主权的“麦克马洪线”，在从逐段处理原则转变到打包原则以及提升文化和商业联系方面，中国的拖延策略是中国与印度进行的多变游戏的一部分。④拉金德拉·普拉萨德还认为，中印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于潜存着中国战略立场下的长期的、野心勃勃的目标。⑤至于所谓中国谈判态度不积极的具体原因，印度学者看法各不相同，主要有：中印边界问题及其处理在中国并非核心问题；⑥“麦克马洪线”，特别是西藏问题导致中国不愿处理边界问题；⑦中国要求印度率先让步；⑧现状让中国满意和对中国有利。⑨在指责中国没有谈判诚意的同时，印度学者还宣扬本国政府重视并积极参与中印边界谈判。有学者认为，正是对中国的谈判态度存在怀疑和不满，1999年中期以来印度政府将边界问题置于中印交往的中心，在两国高层会谈中一再提及需要处理边界问题。⑩

　　然而，也有印度学者认为，中印边界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印度也有责任。古尔纳姆·辛格就指出印度最初的谈判态度并不积极，“印度政府是一个不情愿的开始者。因为没有一个满意的边界问题协议，任何走向对华友好关系的认真试探都会侵蚀执政党的群众基础。”(11)还有学者指出，印度表现为更急于达成协议，这可能是一种外交姿态。(12)高塔姆·达斯还认为，“作为‘相互让步’一部分的‘放弃’任何领土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从拉吉夫·甘地到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印度政府的基本方法是将中印边界安排留给遥不可知的未来。中国当然认为印度对处理问题没有兴趣。”(13)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边界协议至今没有达成，中印双方都有责任。如纳穆拉塔·戈斯瓦米等人指出，“审视正式谈判可以发现，双方没有达成谈判协议的动力。谈判进展有限，双方的兴趣看来是保持现状。”(14)S.辛格也认为，“中印都有合理的理由与兴趣保持和平，并不愿改变现状。但是，目前两国政府都不愿将现状作为正式边界加以合法化。”(15)

　　印度学者对中印边界谈判进展不满，主要是期待加快中印边界谈判进程，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在印度已成为共识。迪帕克就指出：“处理问题有三种选择：一是开战；二是无限期搁置问题；三是加速现存的对话机制，让公众准备接受一个边界问题的双赢协议……前两种方式因让中印没有出路而无效，剩下的唯一选择是加速高层对话机制。”(16)然而，多数印度学者对在近期内达成中印边界协议不抱希望，有的学者还认为，中印边界问题今后可能依旧不能解决。(17)

　　二、对于中印边界谈判难题和障碍的理解

　　中印边界谈判历时长久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高塔姆·达斯认为源于众多的问题阻碍双方达成一致，主要包括：因“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问题中国可能不想在2020～2030年前完成谈判；中国提出收回达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阿克赛钦问题要求印度接受中国的实际战略需要和现状；中段存在着比较小的争议区；达赖在印度的存在；印度特别边境部队中存在一支由流亡藏人组成的22军；中国不断地援助巴基斯坦。(18)概括而言，领土调整、实控线确认以及西藏问题是印度学者公认的阻碍中印边界谈判的主要难题。

　　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特别是东段地区面积较大并涉及两国的国家身份和民族感情，达成让双方国家和人民都满意的领土调整的难度很大。米拉·辛哈·巴塔查尔吉就认为，中印边界此段的基本问题是这个面积广阔的领土区域，而不只是边界线的调整。(19)对于边界东段，自尼赫鲁时期以来，印度政府和公共舆论都有意无意地宣扬中国事实上遵守并愿意接受“麦克马洪线”。在印度看来，1914年《西姆拉条约》已经划定了中印边界东段边界，只是没有进行正式的中印联合勘界，西段没有得到中印条约的确定，从技术上看更有争议性。(20)也就是说，印度期望的边界处理方式是，在东段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则撤出1959年到1960年的控制区。印度学者意识到印度通过和平方式难以收回所谓的“失地”，但又认为没有哪一届印度政府能够做出领土让步。(21)

　　实控线的确认也是中印边界谈判的主要难题。中印之间的实控线主张分歧由来已久。据学者刘学成考察，历史上中印之间有四种实控线主张，一是1947年英国离开时的边界线，二是1959年11月中国提出的并得到科伦坡会议认可的边界线，三是印度政府提倡的1960年9月边界线，四是当前的实控线。(22)然而，即便是对于当前实控线，中印之间也存在较大分歧。迪帕克指出：“双方观点差异仍然存在，没有放弃早期要求，对于1962年冲突后形成的实控线，双方在许多地点有争议，更不用说双方在边界条约上的差异。”(23)正是双方存在着明显分歧，加上地理问题和政治信任缺乏，中印边界谈判人员确认实控线的工作至今没有完成，这还导致近年来两国都不断指责对方侵犯本国边界甚至多次形成军事对峙态势。辛格认为，两国都派兵巡逻到各自主张的实控线，除了宣示主权外，还是一种谈判战略与筹码。(24)此外，对于艰难达成的维持实控线地区和平局面的几个协议，印度国内也存在反对意见。普拉文·苏希尼就认为，作为事实边界的实控线本身没有确定是1962年战争的产物，至少西段是中国强加的。他还认为，一旦中印关系紧张，实控线的和平与安宁将受到干扰。(25)

　　不少印度学者还认为，西藏问题也是中印边界谈判的一大难题。乌帕德亚雅认为，印度与中国的领土问题主要与藏人、达赖在印度的存在相联，因为这加剧了中国的猜疑，认为印度必定有着一个西藏“独立”的未来蓝图。(26)有的学者还悲观地认为，西藏问题导致中印边界问题难以解决，“尽管印度限制在其领土上的藏人的政治行动，但只要达赖仍在印度，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对达赖在印度的存在极为关切。”(27)尽管不少印度学者意识到西藏问题损害中印互信和中印边界谈判，但某些印度学者却是企图通过西藏“独立”来维护印度的边界利益，提出只有西藏“独立”才能有可靠的、长期的边界问题处理，(28)这一主张毫无疑问会进一步阻碍中印边界谈判。

　　如何认识中印边界谈判的众多难题和障碍呢？印度学者主要是从权力斗争、国内阻力、民族文化心理以及第三方因素等角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第一，争夺地区权力阻碍中印边界谈判。中印边界争端最初是英国殖民侵略所致，但印度独立后边界问题一直存在并不时激化，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这与印度精英试图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建立霸权和寻求大国地位有关。印度学者凯沙夫·米什拉就认为，中印纷争不仅是边界争端还是权力斗争，双方误解只是加剧危机。(29)实际上，印度学者主要是指责中国在亚洲特别是南亚的“霸权”目标阻碍边界问题处理，如夏尔马等人认为，“如果中印边界问题没有处理，不是因为印度政府没有在合理基础上处理问题的兴趣，而是因为潜存着中国战略立场之下的长期的、野心勃勃的目标。”(30)莫汉·古鲁斯瓦米等人甚至认为，中国是不受公共舆论妨碍的国家，在边界问题上不愿做出让步，原因是对在亚洲唯一能挑战中国寻求领导地位的印度的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怀疑。(31)

　　第二，国内政治制约中印边界谈判。边界问题属于外交问题，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印边界谈判毫无疑问会受到各种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德胡指出，“双方的国内政治和决策过程能影响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印度安全分析家、外交机构以及军队，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军队以及日益发展的安全团体，都寻求影响对方的政策，……国内政治有潜力推动双边关系走向更加冲突的方向。”(32)印度学者主要是分析了议会、政府以及媒体对包括边界谈判在内的中印边界问题的影响。

　　议会对中印边界谈判的限制，主要来自于1962年11月7日印度议会通过的一项“收复失地决议”。西德胡认为印度要处理边界争端就需要修改1962年决议。(33)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决议实际上已经失效，因为1967年印度议会通过的一项非法律行动法，取代了所有已经通过的决议并允许经过条约的领土让步。(34)然而，按照印度宪法的规定，印度所有的领土变更必须获得议会批准，印度政府并没有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解决领土争端的权利。

　　在中印谈判方面，印度政府的问题不仅仅是没有最终决定权，还有大多数时间印度缺乏强有力的政府，而处理边界争端要求两国都有强大政府。(35)冷战结束以来，印度主要是党派联盟执政，没有一个政党能在议会占据决定性地位，这不利于印度开展边界谈判，“尽管全国日益意识到印度几乎没有机会收复失地——无法进行一场代价难以接受的大战——但在印度没有政府能够做出涉及大片领土的让步，这些领土是1962年中国侵略之下印度不得不放弃的。”(36)印度政府无力与中国达成妥协，也无法让议会和公众走向最终妥协。努拉尼抱怨，在最近四十多年中国比较积极时，(印度)没有一个总理能够或者敢于通过教育公众观点形成国内共识，抓住机会与中国进行认真的谈判。(37)

　　中印边界争端扩大化以及难以处理，印度媒体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在印度政府和媒体的共同作用下“受害者心理”成为印度人对华集体心理。乔杜里还指出，“边界战争失败的羞辱在印度报界产生了长期的反华传统，就这点看甚至现在也没有变化。……在印度媒体上，许多攻击中国的新闻是自发性恐惧、嫉妒、焦虑以及咆哮的混合物。”(38)而古鲁斯瓦米等人还认为，印度的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有责任显示自制，特别是涉及敏感问题方面，如果能够避免不负责任的评论和想法，印度的谈判地位将大大提升。(39)

　　对中方而言，开展中印边界谈判也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苏达·拉马钱德兰就认为，中国国内发展特别是民族主义抬头将限制中国的领土要求并使中国走向边界妥协。(40)巴斯卡尔·罗易则考察了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作用，他认为：“在边界事务特别是领土和战略调整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很大的发言权，……解放军负责保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不允许放弃一寸领土。他们没有说争议领土是否可以按照相互让步来谈判处理，……看来解放军决定采取强硬立场，政府不能公开指责解放军。此前中国给予印度克什米尔军官B.S.贾斯瓦尔中将另纸签证就是解放军的决定。”(41)但是，也有印度学者突出印度政府的国内压力，无视中国的内部制约，强调印度是民主国家，因此难以达成共识，而中国政府更容易做出妥协。(42)边界和领土问题涉及国民感情和国家利益，印度这种无视中国人民心理或意愿的看法显然无助于两国达成边界妥协。

　　第三，文化心理因素对中印边界谈判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印两国都成为西方国家欺凌的对象，殖民压迫没有使两国人民丧失民族自豪感，但毫无疑问，也严重挫伤了各自的民族心理。一方面，建国后中印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十分强烈；另一方面，两国国民集体心理中都有挥之不去的“受害感”，这些阻碍了双方达成边界妥协。普拉沙德·帕拉梅斯瓦兰就指出，双方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使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达成处理争端的最后决议，1962年的中印战争所造成的羞辱感在印度依旧清晰，西藏事务仍是涉及中国内心情感的问题。(43)

　　从目前情况看，印度的1962年阴影是中印达成边界协议的巨大障碍。尽管最近印度有媒体文章指出1962年的“受害者心理”是印度政府制造的，(44)但这种理性态度在印度不占主流。谢卡尔·古普塔认为，印度社会一直为1962年阴影困扰，“在我们的头脑中，中国从来就是我们最严重的安全威胁，……由于缺乏对1962年战争的公正评价和理解，印度的两代半人是在对中国的担忧下长大的。”(45)印度反华心理严重阻碍了中印达成边界妥协，阿尔卡·阿查亚等人甚至认为，印度有的精英不信任中国，意味着印度仍然是谈论中国而不是与中国谈判。(46)

　　第四，外部因素阻碍中印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的障碍除了两国内部阻力以及双边矛盾外，还与一些外部因素有关，目前主要是美国因素和巴基斯坦因素阻碍中印达成边界妥协。印度学者比较关注中巴关系以及影响，如Z.D.辛格认为，尼赫鲁时期印度政府不愿接受中国的阿克赛钦要求，可能是认为这会在更激烈的印巴克什米尔之争中使印度的意识形态复杂化。(47)对于中印巴边界问题，斯瓦米主张优先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他认为印度最重要的外交任务是瓦解中巴同盟，印度领导人要转变观念，解除1962年遗留问题。(48)

　　虽然美国没有公开干预中印边界谈判，但近年来美国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政策，严重削弱了印度与中国达成边界妥协的意愿。如印度安全专家、前情报官员维伦德拉·萨海·维尔玛就认为：“2006年7月18日《美印核协议》以及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问印度使南亚形势发生转变，两线防御的压力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印度向美国倾斜十分明显，印度应该等待地缘战略转变的出现，并不急于与中国签署协定，在阿克赛钦以实控线为基础的任何协定都是目光短浅的。”(49)布拉马·切拉尼还将近年来中印边界局势紧张归结为中国对美印关系的不满，“从2005年美印达成核协议后，中印关系经历了一段动荡时光……中国官方媒体的立场日益强硬。”(50)

　　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各种主张

　　中印边界谈判问题重重，最终将如何处理呢？印度专家狄伯杰总结指出，中印边界和平解决有四种可能方案：“(1)是从传统和历史中寻找解决方案；(2)按分水岭的原则解决；(3)将实际控制线作为边界；(4)一揽子解决方案。”(51)他认为，相比较而言，一揽子方案是解决边界问题的最合理方案，因为其他方案问题很多并难以实行。历史法律方案的问题是，印中双方只埋头于各自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传统控制线和只看到自己承认的条约和地图。分水岭方案的问题是，目前的实控线在许多地方并不完全符合分水岭的原则，在某些地势比较复杂的地段分水岭原则很难贯彻，而且中国认为分水岭并不是唯一或主要的划定边界的国际原则，其他的河流、山脉走向等地貌地形都可以用来划定边界。至于实控线方案，他认为对印度来说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因为目前的实控线是中国单方面改变并强加于印度的。对于一揽子方案，迪帕克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即印方采取分段解决方案，迫使原来提出一揽子方案的中方改变立场，但他相信，如果中印在某些地区做出相应的让步和妥协，将实控线作为边界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而这就是中国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52)

　　实际上，印度学者在采取何种方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对于迪帕克支持的一揽子方案，有的学者表示赞成，认为确立一个处理边界争端的一揽子处理框架比较适合于新德里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区领土权利采取的回避态度。(53)但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莫汉·古鲁斯瓦米认为印度不会同意以西换东，这会让中国占有阿克赛钦合法化，与印度更合法地统治“阿鲁纳恰尔邦”不对等，这里不需要中国的法律支持。(54)达尔也指出，中国对“阿鲁纳恰尔邦”的要求是为了兜售中国不能放弃的交换阿克赛钦的一揽子交易。(55)对于迪帕克不太认同的分水岭方案，有的学者却十分推崇，维尔玛还提出，在阿克赛钦的边境划界要沿着将印度河水系和喀拉喀什水系、莎车水系分开的拉克特桑(Laktsang)山脊划分，而且，中印边界地面划界要求将分水岭原则与实地修改或调整相连。(56)还有学者主张按照实控线划分边界，因为如果接受“麦克马洪线”为东段边界实控线，就不存在曾经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分水岭位置之争。(57)

　　印度学者对于中印边界解决方案的意见不一，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路径选择方面也存在明显分歧，总体上可以分为要求中国做出更多让步的强硬派传统路径和努力促成双边妥协的温和派建设性路径。

　　第一，强硬派企图迫使中国做出更多让步。尼赫鲁时期印度僵化而强硬的边界政策导致中印边界争端从纠纷走向冲突，如今印度在承认边界争端和通过谈判处理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承认存在争端与承认印度立场有误不同。(58)也就是说，尽管印度同意开展边界谈判，但并不愿意做出边界让步，“从印度的战略观念来看，其在次大陆的核心安全利益——领土完整、经济发展以及周边安全——这些不能因与中国在全球和体制层面的更广泛合作而牺牲或者放弃。”(59)在边界东段，印度普遍不能尊重和认真对待中国对于“麦克马洪线”以南特别是达旺地区的领土要求，他们或者认为中国强化在东段立场不过是一种谈判策略，或者认为体现了中国军方的作用，或者强调印度在该地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统治合法性。(60)在中国控制的边界西段，多数印度学者反对实控线处理方式，认为现在的实控线是立足于中国的侵略，违背了国际法。

　　为了迫使中国在边界谈判中让步，印度秉持强硬立场的学者提出了众多的措施和建议。阿班提·巴塔查里亚提出，印度应该采用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的核心。只要边界问题没有处理，就不会有和平的中印关系。因此，印度的对华政策不能立足于希望和假设，而是要立足于对中国战略和外交政策动机的真正理解。印度在建设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还要有一个立足于说‘不’的务实稳健的对华政策。”(61)他主张，“通过发布关于争议问题的立场文件与白皮书来重申我们的外交政策立场……在有助于我们周边战略的边境地区采用积极的经济政策，是增强我们对外政策手段的另一个重要方式。”(62)古鲁斯瓦米等人主张，印度要在“麦克马洪线”想方设法显示存在、详细记录边界沿线技术性的错综复杂的中国入侵并准确分析对于中国谈判战略的意义，并指出印度格外需要在北部边界保持军事方面的谨慎。(63)近年来，不少印度学者主张通过打“西藏牌”来迫使中国做出边界让步。阿贾伊·舒克拉还指出，印度在西藏拥有合法和不可剥夺的利益，即重设20世纪50年代关闭的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边界贸易、宗教联系、旅游和人员来往。他还说，印度不应该继续按照中国的规则只讨论“阿鲁纳恰尔邦”而不讨论西藏，新德里应该开始在特别代表对话中提出西藏问题。只要谈判只涉及边界，就不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通过对中印对话的战略性调整，至少将某些聚光灯转向西藏，新德里能够刺激北京软化其不妥协立场。(64)Z.D.辛格还认为，“一个解决中国的西藏困境与中印边界问题的激进方法是，通过广泛的地缘政治对话可以形成绝佳的框架。”(65)

　　尽管印度强硬派学者希望并试图使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如莫汉·古鲁斯瓦米等对中国的让步期望不高，“最后分析是任何严肃认真的中印谈判将是灵活性有限并放弃极端立场……未来的处理办法与当前现状不会差距甚远。概括而言，中国将放弃对‘阿鲁纳恰尔邦’的要求，印度则放弃拉达克部分，在某些地方做一些边界调整。因而，虽然相互让步以新条约展现，但只是围绕着现状的一种法律安排。”(66)

　　第二，温和派提出达成最终处理的建设性路径。温和派也意识到中国不会轻易做出边界让步，如S.辛格指出，“中国不会做出领土让步，中国认为与印度改进关系重要，但没有重要到要求牺牲地位、利益或领土的地步。”(67)在一次关于边界与印度安全的讨论中，有的印度专家认为：“边界不能只靠枪炮保护。实际上，‘紧张’和‘变动’的边界损害经济和加剧不安全感。印度必须将边界看作友谊和友好的纽带。还要将这一观点运用于与邻国的关系之中。与邻国没有和平边界，印度不能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事务中扮演合法角色。”(68)

　　在意识到中印都不会轻易做出让步后，秉持温和立场的印度学者提出向前看，采取广泛措施实现双方满意的、公正合理的全面处理。一是印度应该采取措施积极推进边界谈判。达斯表示：“因为中国对仅让现状正式化的谈判不满，印度不得不让谈判新鲜化，表明对尽快达成最后协议是认真的。”(69)在印度学者看来，印度政府首先需要推动国内就对华政策和边界谈判形成共识，(70)接着是采取措施推动边界谈判，如修改1962年决议、(71)教育公众和媒体接受领土或主权调整。(72)二是通过经济交流、人员来往等方式建立中印互信。迪帕克建议，为了全面处理边界，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中印都忘记过去，印度不应该谈1962年“收回每一寸印度领土”的议会决议，中国应该停止重复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他希望通过建立信任措施、发展贸易联系和人员交往能够建立信任并最终达成公平合理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73)三是中印应该理解彼此的边界心理和利益诉求。尼赫鲁时代印度完全忽视中国的边界心理和利益诉求，当前印度政府也主要是关注自身的边界心理和诉求，这显然无助于两国达成边界妥协。戈斯瓦米等呼吁，“中印谈判代表首先必须不仅理解自身利益，还要对对方立场有清晰的感觉。理解对方的观念和文化十分重要。例如，社会稳定对中国十分重要，印度应该努力理解这对‘阿鲁纳恰尔邦’特别是西藏和达旺问题的争端的意义。同样，中国也应该寻求理解印度为何坚持对‘阿鲁纳恰尔邦’的主张以及从印度角度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国际事务上，中国将自身看作是受害者并提出对边境地区的要求。印度必须理解为何中国从怀疑‘遏制’论的更大视角看待印度支持达赖及西藏流亡‘政府’，近年来美印战略关系的加强进一步增强了中国这种受害感。”(74)四是印度应该慎用西藏牌。近年来，“藏独”集团反华活动日益极端化、暴力化和国际化，印度国内也出现要求利用西藏问题迫使中国做出边界让步的声音。但是，也有印度学者理性地认识到印度不应该干预西藏问题，“在这一领域印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导致的将不仅是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还会促使中国立即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印度的最佳作用是改善中印关系，让中国不做过度反应和断定印度利用西藏形势制造对华安全威胁。同样地，希望在未来某一时刻中国感到足够安全而急剧地减少其在西藏的民事和军事存在。”(75)

　　在中印边界谈判问题上，印度温和派显然比强硬派更倾向于促成中印妥协和维护中印友好关系，但毫无疑问，他们也致力于维护印度的边界利益，不会轻易向中国立场让步。此外，印度强硬派和温和派都主张不能搁置边界问题，如强硬派代表拉贾·莫汉强调，边界问题遗留对印度危害很大，“不愿处理中印边界争端和印巴查谟—克什米尔问题削弱了独立以来印度的军事和战略力量”。(76)

　　四、印度学界中印边界谈判研究的成绩、局限以及启示

　　长期以来，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探究和推进两国边界谈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印度学者对中印边界谈判进行了大量报道和分析，成果形式以论文为主，鲜见专著。在边界谈判的进展与成效、边界谈判僵局出现的原因、当前谈判难题和障碍以及未来出路方面，印度学者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总体而言，印度学者的观点比较多元化，如在中印边界谈判进展缓慢原因的分析上，虽然印度学界主要是指责中国缺乏谈判诚意，比较难得的是不少学者没有盲从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探究了印度方面的责任和问题，体现了从事学术研究者应该具备的求真务实精神。此外，印度学者还比较关注现实问题，积极而大胆地探讨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措施。

　　然而，印度学界的中印边界谈判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是印度学界对中国谈判诚意和意图的批评比较情绪化，缺乏说服力。对于中印边界谈判进展缓慢的原因，印度学者主要是将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或指责中国不愿意让步，或认为中国对现状满意，或断定中国不太重视中印边界谈判问题，无视中国政府1960年以来争取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因中印边界谈判工作的详细信息并未对外公布，印度学者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推测乃至臆测，主观主义色彩浓厚而学术客观性不足，存在明显的学术偏见。其次，印度学界坚持印方边界主张，强调乃至夸大妨碍印方走向妥协的各种障碍，很少关注近年来印度在东段争议地区巩固占领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动对中印边界谈判的消极影响，对中方立场、和谈障碍以及中国学界的有关研究更是缺乏关注。其实，经过多年的学术探究，许多印度学者认识到“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者在喜马拉雅山区扩张的结果并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但因获得一条沿喜马拉雅山脊蜿蜒的天然疆界是印度的国家利益所在，所以他们致力于为印度占领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辩护及寻找合法性。这些问题显示，印度学界关注的还是自身的边界利益和诉求，对中国的边界心理和诉求缺乏了解，更谈不上尊重。最后，印度学界的中印边界谈判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待提升。目前，印度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有关成果缺乏客观和严密的论证，更欠缺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的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成果。如就国内因素对中印边界谈判问题的影响而言，除了提及主要政治机构的作用外，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从政治体制、政党制度、外交决策机制、民族文化、公共舆论、意识形态等方面探讨中印各自国内情况对两国边界谈判的影响。再如中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影响到了两国的谈判行为，但学者们只是关注两国商业谈判差异及其文化根源，笔者未见关于两国边界谈判的文化视角分析的成果问世。

　　虽然印度学界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通过总结和分析印度学界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学界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一些问题，从而促使我们思索今后研究工作和实际谈判工作的改进方向。

　　首先，在研究内容方面，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研究是历史总结和分析多，对策建议少，也没有细致深入地研究中印实控线纷争和中国国内不利于中印谈判的障碍因素。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是关注两国边界谈判历史进程和印度在东段的强化占领，很少探讨未来解决方案及其具体措施。对于实控线问题，不少印度学者探究了中印实控线纠纷及解决方案，并指责中国有意拖延东段和西段的实控线确认导致当前的谈判工作停滞不前。对此，中国学者很少做出回应和公开澄清，如果长时间内人们只能听见印方的单方面指责而没有中方发出的声音，自然会误认为印度的说法正确和可信。

　　其次，国内学者应该关注印度学界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研究现状。虽然印度学界关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看法和主张并不等同于印度政府的立场，但学者们的专业成果对印度政府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中印边界谈判重要平台之一——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印度学界在中印边界谈判中也会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印度学界专家还在各种媒体上谈论中印边界谈判问题，对公众认知和印度的公共舆论有着相当的影响。因而，国内学界应该关注印度学界的看法和主张，还应该通过各种渠道与印度学界加强交流和沟通。

　　再次，国内学界也需要进一步拓宽加深对中印边界谈判问题的研究，如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印两国的边界政策与立场演变、各自的外交谈判文化与风格、双方的边境地区管理政策及理念等内容，以期更好地把握和推进两国的边界谈判学术研究乃至实际工作。

　　最后，中国应该关注印度在中印边界谈判方面的两个动向：一是某些印度人越来越倾向于将西藏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相连，企图利用“西藏牌”来迫使中国在边界谈判上做出让步；二是印度学者的边界立场仍然比较僵化，普遍不能尊重中国在藏南地区的边界利益主张和边界心理诉求，将中国的边界主张视为一种谈判策略，一直企图让东段现状正式化。今后，我们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各种场合强调我们关于东段争议区的边界主张，让印度丢掉幻想、改变错误认知，正视我们的边界诉求。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印度的西藏政策动态及时了解和全面研究，以准确把握印方动向、制定全面的预案，有效防备和恰当应对印度在边界谈判中打出“西藏牌”。